



# 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萧华



1916年，父亲萧华出生于江西兴国一个贫苦泥瓦匠家庭。为了能够读书，父亲从小刻苦学习，总是考第一名，在萧氏家族奖励资助下，得以完成学业，一直到他参加红军。

参加红军后，父亲先后担任连、营、团政委，他任团政委时才15岁。16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，34岁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。39岁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。

记得我上中学时，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，父亲的回答是：“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。”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在长征中，父亲是师级干部，部队配发了马，但骑在马上往往不是父亲本人，而是伤病员。过草地时二师一个非常能打仗的连长周长胜负伤不能走路，父亲下令用自己的马驮着周连长走出草地。到了抗日战争时，周长胜缴获敌人一匹好马，跑了几百里地，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把马送去给父亲，父亲坚决不收，最后还是115师代师长陈光说：“老萧，你不要，我要。”才算打了圆场。

遵义会议后，“少共国际师”（由一群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装部队）被遣散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，父亲改任一军团组织部部长。由于父亲善于做思想动员宣传等工作，军团首长随后任命他带领先遣工作团随先头部队行动。从此以后，长征中任何重大军事行动，父亲始终身先士卒，冲在第一线。他亲自带领先头部队，有时作战前动员，有时会亲自吹冲锋号……突破乌江，巧渡金沙江，彝海结盟，强渡大渡河，飞夺泸定桥，过雪山草地、腊子口，直罗镇战役，东征，西征……都有他的身影。

特别是彝海结盟。父亲带领先遣队和小叶丹的四叔谈判，耐心做解释说服工作，不仅说服他放弃让红军帮他打冤家的想法，还采纳了通司（翻译）沙玛尔果的建议，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结为兄弟。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得知谈判结果喜出望外，立即骑马来到彝海边与小叶丹歃血结盟。年仅19岁的父亲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机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促成汉彝结盟，表现了他过人的才能。

长征胜利后，父亲率领二师东征，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，被敌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，负重伤。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，看见后续部队四师的同志们时，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：“四师、二师比比看，谁是英雄，谁好汉！”四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，冲进硝烟……随后，在没有麻药、没有手术台、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，军医用菜刀给父亲做手术。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，嘴里咬着一条毛巾，一声未吭。等手术完成后，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即便这样，军团首长也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，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。

父亲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躺了一个月，伤未痊愈便回到红二师，这也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离开一线部队最长的一次。

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，我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战斗里，战士大部分是被冻死的。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上，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看到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，就把自己的袜子、大衣脱给战士，当父亲看到冻得直流眼泪的韩司令时，又把自己的大衣脱给韩司令……

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，不管谁和他搭档，父亲总是挑重担，把战场准备工作、后勤工作、干部思想工作、部队和地方的动员与协调工作甚至干部家属工作，全部一肩挑，默默干活，有了错误自己承担，有了成绩归功于他人，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。

父亲过世后，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：和老萧（指父亲）共事的那几年，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愉快的几年。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“分家”时，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。

萧云 据《文史博览》

## 瞿秋白的“提案”



瞿秋白也写过“提案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 
1924年1月，国民党一大召开，当时瞿秋白与毛泽东等一起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，瞿秋白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员。

瞿秋白早在1918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，1920年后，又以记者身份赴莫斯科，在苏俄采访学习了近两年，广泛了解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方方面面。瞿秋白认为，列宁走的路，俄国走的路，就是中国今后的路。

1924年1月21日，列宁去世，瞿秋白立即写了多篇纪念文章，一方面当然是表达对这位革命导师的怀念，更重要的是宣传列宁的革命思想。瞿秋白认为，与其他众多社会主义思想家相比，列宁的特点“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践”。

瞿秋白经过深思熟虑，感觉中国要走俄国道路，必须将列宁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。于是，当年4月5日，瞿秋白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和谭平山写了封信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就相当于一件重要的“提案”。“提案”的内容是建议国民党组织力量编译《列宁文集》。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，只有国民党才有财力来做这件事。“提案”中，瞿秋白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可以承担“总校订之责任”，相当于总纂了，真要做起来，这个担子是不轻的。

廖仲恺时为国民党左派，而谭平山则是中共党员，瞿秋白向他们二人提议，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向国民党中央反映此事。

“提案”很快报到孙中山那里，4月14日，孙中山就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第21次会议，讨论了这件事，会上说成是要编《列宁全集》。可以看出，孙中山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同时发扬民主，让大家研究这个问题。然而，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戴季陶提出不同意见，说要先编译《苏俄法制全集》，《列宁全集》的事暂时缓一缓。

瞿秋白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“提案”可能实现不了。他在当年5月6日给鲍罗廷写信说，国民党右派似乎在有组织地活动，他们正在进行有针对性地煽动，不仅是反对我们，而且是反对国民党左派。瞿秋白的预感是对的，他的那件“提案”最后以各种理由被国民党右派否决了。

周二中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杨步伟的抉择



32岁那年，杨步伟和赵元任结为伉俪。婚后不久，赵元任得到一个以北大教授的身份赴美进修的机会，除此之外，北大每个月还会给他赞助200美元的生活费。不过，此时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摆在了妻子杨步伟面前：要不要和丈夫一起前往美国？

两年前，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同学李贯中刚刚办了“森仁医院”，此时的医院正是需要她领导一切的时候，如果现在去了美国，那她辛辛苦苦打下的这份基业就会失去；同时，虽然杨步伟之前留过学，但她的英语水平有限，如果去了美国后无法行医，那她就失去了立命之本；更关键的是，她的身份也会由之前受人尊敬的杨医生，变成相夫教子的赵夫人，人生落差可想而知。

不过，此时的杨步伟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果断和坚韧，她一句话让丈夫赵元任吃了“定心丸”：“不用担心我的任何事情，为了你的事业，我打算陪你前往美国！”望着妻子坚定的眼神，赵元任感动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。

初到美国，夫妻两人的生活过得非常寒酸，租住的房子连桌子和床都没有，他们甚至打了十几天的地铺。为了改变这种窘境，杨步伟开动脑筋，她先是跑到商店橱窗研究了半天手提包，然后当掉了3件狐皮服装，换到了启动资金45美元。接着，她以月付的形式买了一台缝纫机，仿照商店橱窗里的手提包样式，做了许多漂亮的手提包。一个多月后，这些手提包给

他们带来了500美元的收益。

看到妻子没日没夜地忙碌，赵元任心疼不已，他随即放下架子，跑到妇女俱乐部演讲，每次能够拿到200美元报酬。经过夫妻两人的一番努力，他们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。

后来的许多场合，谈起自己当初的抉择时，杨步伟都会平静地表示：“没什么可后悔，这实在是一件平常的事情。因为这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都要学会放弃一些事情。”

姚秦川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